



聚焦文学新力量

文珍,生于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与研究方向硕士。在《人民文学》《当代》《山花》《大家》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万字。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曾获“西湖”新锐文学奖、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提名奖等。

从幻灭到追求

□饶 翔

“80后”女作家文珍的写作从个人出发,由一己的爱恋悲欢、浅吟低唱或者内心的风暴生发开来,渐渐辐射至更为广阔的社会与时代。十余年来,文珍从一个“小资文艺女青年”成长为女作家的历程,或可借用茅盾《蚀》三部曲的命名来概括:幻灭——动摇——追求。

从幻灭开始

正如文珍的第一部小说集的书名《十一味爱》所昭示的,爱情一度构成了文珍的“世界观”,构成了她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一种重要的角度和方式。以形而下之视觉、嗅觉与味觉写形而上之爱情,是作者惯用的象征手法。在她早先的三篇直接以食物命名的小说中,这种倾向更是明显:《色拉酱》——丰盛之爱;《果子酱》——甜腻的俗世之爱。这三篇小说均为文珍在攻读北大创作学硕士学位时期的“习作”,有着浓重的“文艺腔”,也散发着强烈的文珍式文学气息。

文珍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她操练着文字的炼金术,遣词造句仿若古人吟诗炼字,推之敲之,雕之琢之,文字被打磨得通体透亮、温润如玉,极雅致,极细腻,確實才气逼人、诗情洋溢;而她的叙事腔调高度内敛,叙事空间又极封闭,全是以内心意识流动,似叹似息,如呓语。

《果子酱》堪称文珍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她赢得了最初的荣耀,获得北京大学首届“王默人小说奖”第一名。小说几乎不是靠情节,而是靠细节和情绪的叠加和发酵完成叙事的。来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舞者萨拉背井离乡来到广州的一个酒吧表演费兰明高舞,爱上了在同一酒吧谋生的同乡、贝斯手鲁斯特。这段爱何其浓烈,却又何其隐忍,不曾言明又不言自明。这爱完全是不及物的,与日常生活无关,只化作生命之舞、灵魂之舞。萨拉的爱犹如一场内心的风暴,乍起骤灭。颠沛流离的命运尚且没有令她幻灭,错爱的痛苦——鲁斯特大啖果子酱的一个动作却足以令她幻灭。“她千里迢迢地来了,却料不到遇到的人仍然是错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她只是觉得很幻灭。”“很幻灭。”夹杂着叹息声的喃喃自语、浅吟低唱,是彼时作者经典的叙述语调。

作为一名“80后”的写作者,“幻灭”是文珍笔端常常出现的两个字。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代人情感和内心的真实经验。这是一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历史/现实虚无感。文珍认真地呈示了这个并无兵荒马乱的“太平盛世”里的情感幻灭,以及因幻灭而生的疼痛,她的幻灭因之不显轻飘,反倒形成了一种美感和悲剧感。或许可以称她为一名真诚的幻灭书写者。

动摇: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果子酱》是关于艺术的、关于爱的凌空虚蹈,是作者以小说形式所作的爱的哲学思辨。在《关于日记的简短故事》及“外一篇”《关于我所爱吃的花生》中,这种思辨仍在继续。它们事关灵魂的秘密,以及对这秘密的细心看护。在文珍高度内敛甚或自闭的叙述里,爱情甚至无需对象,也与所爱者几无关系;爱是在想象之中,在心灵之上隐秘孕育、生长,拒绝表演、甚至放弃言语交流,直至内心孕育成熟的一枚巨大的果实,这隐秘的狂喜仅供独自咀嚼,独自品尝。

而在文珍稍后创作的《衣柜里来的人》和《气味之城》中,爱情动摇于想象与现实之间。两篇小说有某种主题上的延续性:前者写的是准婚状态,而后者则描摹已婚状态。

都市女孩小枚与男友C相恋多年,在面临婚姻的门槛时犹豫不决,不辞而别只身去了西藏。这是她的第二次西藏之旅——半年以前,在对未来的规划与男友产生分歧之后,她也曾走出拉萨,在此结识了一群“拉漂”,并与其中的一个名叫阿七的男子产生了似有若无的感情。西藏与漂泊

沧桑的阿七在她的潜意识中,隐隐成为庸常生活的反面,吸引她再度寻访。然而,面对阿七的追求,她又退却了,这一方面是她的道德感使然,另一方面她并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爱阿七。在与阿七同游纳木措的途中,她得知了阿七曾因热爱旅行而痛失所爱——那提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危险。她也开始想念相隔遥远的男友C,那是一种熟悉而安稳的日常生活。最终,她放下了阿七,回到属于她的、虽时感窒息沉闷,但又割舍不下的生活。《衣柜里来的人》便是这样一个逃离——回归的故事。作者以反浪漫的方式,呈现人物内心真实的困惑、动摇、纠结与抉择——关于什么是“爱”,关于生命的意义何在,关于什么是我们应过的生活。

《气味之城》的叙事则更为虚化,它又一次显示了文珍构思意象的才华。两个人的婚姻“围城”,各种气味充斥弥漫其间,每一种气味都是一段生命的印记,都是“活过”的证明。在她离家出走之后,他于她留有的气味中感知她的存在,他凭借对于气味的记忆,追缅过去的好时光;他于气味的变异中觉悟到爱情的僵死本质,觉悟到自己婚后如何凝滞于平庸的生活,如何以自己的慵懒疲惫与漠然无视冰封了另一个鲜活的生命。他懊悔不已,痛哭流涕,他想告诉她:“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来过?”然而,他们将如何重新来过?在这个精神全面平庸的时代,激情与梦想早已渐渐远去,粗鄙的生活一天天露出它的利齿,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保持对气味(生命)本身的敏感,免于被吞噬,我想,这也是作者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地下》则讲述了一段中年情殇,这是文珍的小说中较具戏剧感的一篇,较为平淡的叙述之下其实暗藏汹涌。“我”于被囚禁在地下密室的人生绝境中,觉悟到年少的背叛如何铭心刻骨地伤害了自己的初恋,如何摧毁了他的爱情乃至一生。而“我”也将为年少时的任性付出代价,背负起灵魂的十字架远行。此情可待成追忆,再回头已是百年身。自此,文珍的小说渐渐地有了沧桑感。

发现时代的“精神内伤”

若以一言蔽之,文珍的小说写的大多是“大城”与“小爱”。文珍曾生活在深圳和广州这两个大都市,后又定居北京,都市经验已深刻植根于她体内。文珍写作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其对都市病和边缘弱势人群的观察勘探和生动的文学呈现。在文珍的理解中,“不是只有进城务工人员才算弱势,有很多有正当职业、收入稳定、但性格相对软弱的人同样属于弱势”。通过对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文珍探讨了当下都市人的生存和精神危机,进而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内伤”。

《第八日》是文珍的“学位作品”,也是她迄今最好的小说之一,充分地发挥了她自身的才华。作者以密不透风的叙事将一个弱者的失败心路展现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顾采采——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女孩儿,一个漂浮在大都市的小人物,一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她何以如此,何以至此?只因身处这个凉薄的世界,她还有微薄的憧憬,还有不少的梦——朋友、爱人,一个独处的空间以及一个安然的睡眠,而她这些微薄的憧憬与不少的梦都一一幻灭了,她陷入了绝对的孤独,成为这个运转不停的大都市里的多余人。在这个硕大无边却又无处安身的北京,分外敏感内向的顾采采比一般人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绝境,而事实上,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成功或是失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顾采采,这是生命永恒的绝境。文珍以她的深刻体察与明锐发觉,写出了她自己的“城市文学”。

《录音笔记》仍聚焦顾采采式的都市边缘人。礼品公司的接线员曾小月除了拥有一副好嗓子,并无更多资本,因而无法引起他人关注,既缺乏男人青睐,在公司地位也很边缘。对于声音的敏感,使她总是能听到身边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对话,也时常被淹没在电话铃声、顾客的扯皮和投诉声浪中。曾小月在种种噪声中苦苦挣扎,终于有一天她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录音笔将

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再放给自己听,以此将自己同她所不堪忍受的环境隔绝开来,她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这样的情节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一颗多么孤独、多么卑微的灵魂!进而,这是多么令人窒息、杀人不见血的生存环境!文珍的批判笔触直指当代人泛滥的“一腔废话”,以及由此造成的沟通的虚妄与人心的隔膜。

文珍现在居住在北京一个叫安翔路的地方。她的住所不远处是我们这个伟大盛世的象征——“鸟巢”,而近处则是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文珍穿行于其间,构思于其间,便有了《安翔路情事》。仍然是“情事”,而此次却将目光从她所熟悉的人群移开,写了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与对门卖灌饼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她有意选取了3个城市空间:鸟巢所代表的硕大无朋的“国际化大都市”地标,安翔路所代表的都市平民的市井生活以及圆明园所代表的传统古典的生活理想,人物浮沉于其间,内心的灵魂纠葛撕扯于其间,无法安适。文珍于时代的大迁徙中体味到“爱”与生命的微末,漂流的人们无家可归,时代轰隆的快车远远地把“人”甩在后面。一场现代都市建设中微不足道的拆迁就足以摧毁一份弥足珍贵的爱情,改写他们的命运轨迹,他们束手就擒、无能为力,但是他们的痛苦却是无比真切的。文珍写出了这个惊鸿一瞥的瞬间,写出了人物如浮萍般的命运,也写出了天长地久的爱情愿景与时代的瞬息万变之间的巨大悖论与张力。身处这个“加速前进”(昆德拉语)的时代中,我们其实多么想要一点安稳。

追求:瞬间与永恒

在今年完成的三篇新作《到Y星去》《我们一定要幸福》和《助理律师奥特曼》中,文珍进一步展现了她切近现实的勇气和魄力。《到Y星去》是一则诙谐幽默小品。都市小白领许先和张爱这对情侣“漂”在京城,面对不断上涨的房租,收入微薄的他们6年里搬了7次家,终于在一个黑夜又被房东赶出家门,流落到青年旅馆。深夜,两人面对天花板上的痕迹,展开了他们对于Y星球“美好生活”的想象。白日梦很快醒来,天明他们又要开始一天的生计奔波,要以仅有的一万多元存款寻找一处尚能落脚的居所。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两人对Y星球“美好”生活的向往、描述,有意味的是,连他们自己都很快感觉到这“美好”的乏味。现实的逼仄限制了一代青年关于未来或他处生活的想象力,令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又生出几多心酸无奈。

《我们一定要幸福》中,几个都市的大龄剩女喊出了“我们一定要幸福”的宣言。然而,故事里却没一个人真正幸福。都市男女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受困于自己无法克服的欲望和现实的种种冲突。小说触及“剩女”与“同妻”等都市新题材。性取向、宗教信仰、个人隐私等等,区隔着人群,但这并非关键,关键是当代人与人之间的互不沟通与不谅解,冷漠、无视乃至歧视,最终彼此倾轧,互相摧毁。

《助理律师奥特曼》中,在律师所当了7年助理律师的“普通青年”宋笑,因为种种屈辱、憋闷,在一个暴雨天准备自我终结,却在营救一个四五岁小孩乐乐的过程中,激发起勇气和能量,成为孩子眼中的英雄“奥特曼”。小说给出了另外一种结尾:天晴了,被救助的孩子如雨滴般“人间蒸发”了,宋笑怀疑,是否真的有过一场雨天的救助壮举,但确凿无疑的是,他借此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文珍为她所善写的都市边缘弱势者完成了一次英雄般的成长,这种成长的力量来自何处?是来自沉睡的英雄主义情怀、朴素的人道主义或是内心善与爱的凝聚爆发?答案似不明晰。值得肯定的是,文珍在人物由弱转强的瞬间,寄予了她对于人类永恒价值的思考与追求。

“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与肉来”。在不断地克服其“洁癖”——文字的洁癖、情感的洁癖、道德的洁癖的同时,文珍的文学也在不断通往一个更真实,或许也更残酷的人类世界。

创作谈

离上一次总结自己的创作已经差不多两年时间了,那时还很文艺腔地说:“但愿自己能够写出生命里的暗与光,又写出那况味的热与凉”——因为实在喜欢《桃花扇》里两句唱词“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然而两年之后我再和人聊写作,只敢老老实实地讲:“如果别人说我这样写古怪、不如以前或者比以前更好,我都只能说没办法,现在的阶段就是这样。”——不是知道自己这样说非常赖皮,可时常连自己也不能解释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得这样写、那个故事非要那样结局,好比台下看客明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镜花水月终为虚幻,台上戏子却早已戏假情真魂不附身不由己。

关于写作这回事,每位作者的各时期观感都各不同。但这一刻,我想把写作生涯比作一条河流——当然这个譬喻大概并不新鲜。

作为一个资深驴友,我曾经背包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也有幸见过很多有名无名的大河小河——河流也许是这个广袤无边的世界上最意味深长的一种物理存在,从冰天雪地极境高寒之处蜿蜒而来,流经无数城市、乡村、草原、森林,穿越丘陵与国境线,最终消失在某个波涛澎湃的入海口或者宁静如死的沙漠腹地。通常来说,它们的模样都很美,高低成深,低回作吟,春水碧波满江,夕阳倒映如画。但河流并非永远波澜壮阔,有时候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条涓涓小溪,还有些季节则是全然干涸的河床,直到下一场大雨的浸润或者山洪到来,才会重新波光粼粼,注满生机。

有些意象长久在心底作祟,不写出来好像坐立难安,大概真正的写作就缘起于此,就像春雪必定融化、雨水必定落下、河水必定东流一样势不可挡,绝非个人有一天突然想要当一个作家就可以启动开关,其成就绝非主观意愿想要写得精致、完美、富有艺术性就能决定。

写作的人都是天生怯懦却永远渴望把一切说出的人。

不过如此而已。然而灵感到来缓慢,如同汛期一般看似有规律可循实则常不可预测。一旦到来,干涸已久的河床注满河水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流淌总是不动声色的,生活在周围的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河床土壤重新充满水分孕育的勃勃生机。然而过了几天,水流渐渐从小到大,河水的走向初见端倪,并且从此持续、长久地向海洋奔去。在这漫长曲折的过程中,一个故事渐得以无中生有极尽艰难地诞生。

另外一些更好的时候,头脑中的奇思妙想则汪洋恣肆,像海水一样应有尽有,汨汨无穷。这时惟一需要做的就是极力克制夜以继日的创作欲,尽可能地将之约束在河道之内,怕一只怕一鼓作气,复而衰竭,难以继;更害怕写得太快了,来不及反复思量就误入歧途。有多少次的小说开头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设想过于宏大,开篇过于奇诡,而经验、体力、其他准备渐渐不支,变成一条最终不复存在的河流,没能奔腾到海就渴死在了沙漠里。有时也可能由于河流改造的方向性错误,有时则因为阶段性降水不足。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有,世界上曾经可能存在一百万条河流,而最终为人所熟知的大江大河却不到百分之一。

能够最终奔流到海的河水是有福的。能够尽善尽美地讲述出一个心中故事的写作者也是有福的。河水沿途滋养村庄,故事流传滋养灵魂,这是同样一类在漫长光阴里可以永生也可能速朽的事物。每一年,雪山融冰都会沿着无数条轨迹流下,但并不是每一条轨迹都最终有幸变成了一条有始有终的河流。写作者自然无法决定自己创作之于读者的影响,惟一能做的,只不过是始终如驾驭一匹奔马一般驾驭思路,管理一段河水一般勤于疏通,开篇纵横捭阖一鸣惊人固然最好,更重要的却是厚积薄发、不弃涓滴,持之以恒而得以善终。

作为一个资格尚浅的写作者,我早已放弃开篇即传世的妄念,惟一的梦想,就是每一次开拔,都能够缓缓向东,东流到海。在这个充满了喧嚣和诱惑的世界上,有太多可以让一条河流改道的理由。而即使干涸有时,断流有时,涓滴有时,盛大有时,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想贪心经过所有起承转合的沿途风光,并咬牙度过每一个写不出来一个字的艰夜晚。

河水不能回头,芸芸众生只能在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中寻找无规律之规律,艺术工作者则需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当时当世的浮世绘。不但我认了命,而且也试图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认命,认命的同时当然不代表毫不反抗。他们只是用一种更强大的方式面对一切终将过去的虚无。

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小说人物都是写作者内心的部分映射。比如《第八日》里的顾采采,或者《录音笔记》里的曾小月。但是这些过分懦弱的人物都已是在水流经之地的往日形象了,现在的我却倾向于喜爱那些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主人公们,比如《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里的宋笑。这些平淡无奇的小人物就像《堂吉诃德》里的风车斗士一样可笑可悯,像《项塔兰》里的林一样即便沦为囚徒也并非绝无机会成为英雄,“虽千万人吾往矣”,勇往直前,不必追究这悲剧命运早已在前方不远处,最好到死都不要自知。惟有如此才是真正来过,活过,爱过。

也许我终于从青春期的漫长伤感走出,变得随波逐流了也未可知。但是我喜欢自己这变化,这让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在日复一日的河水流淌中拒不干涸,抗争到底,并且可以永远年轻下去——在自己讲述的故事里。

河水必定东流

文珍

《作家文摘》悦读会开讲“胡适与鲁迅”

本报讯 日前,《作家文摘》悦读会系列讲坛之“胡适VS鲁迅——当代如何阅读大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此次活动由《作家文摘》报社策划并联合九州出版社、北师大风云论坛共同主办。主讲嘉宾为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中国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作家文摘》报社总编辑张亚丽。

谈到中国近现代史,鲁迅和胡适是绕不过去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文学界、学术界都担任过重要角色。作为同时代人,他们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留下的大量作品,于当今社会仍有颇多启示。关于胡适、鲁迅同时代却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耿云志认为,胡适提倡

的是和平改革,认为新制度只有一步步改革之后才能建立;而鲁迅提倡的则是暴力革命,这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此外,这同近代留学日本的多出革命党、留学欧美的多出专家学者有着某种隐性关联。

而在个性方面,孙郁认为胡适在审美上有板有眼,相对比较传统,而鲁迅的表达方式则是“撕裂”汉语,向着未知领域发起挑战。胡适与鲁迅虽然都是包办婚姻,却在对待婚姻的态度方面截然不同。对此,耿云志认为,除了不能违背拉扯自己的母亲外,胡适认为婚姻是种契约关系。而鲁迅则是彻底贯彻个性主义。在孙郁看来,对于长期困扰他们的婚姻问题,鲁迅、胡适都处理得比较妥当。(欣 阅)

《口袋里的中国故事》开启

“2014中华传统文化年”

本报讯 2014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假日经典小剧场将迎来中华传统文化年,陆续推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品儿童剧。日前,中国儿艺“2014中华传统文化年”启航之作——《口袋里的中国故事》在京建组。该剧由青年编剧杜薇执笔,廖伟执导。

剧作秉持讲好中华传统文化年经典故事的原则,向传统文化借故事、借思想,巧妙地把道理、知识与故事融合到了一起,幸福的熊家四口借助口袋里的中华小故事解决生活矛盾,实现了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该剧选取曹冲

本报讯 自首次发表作品至今,香港作家陶然已走过4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近日,由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和江苏师范大学主办的“陶然文学创作40年”学术研讨会在徐州举行,陶然与3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研讨会还就陶然的文学创作、陶然与《香港文学》、陶然的文学活动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陶然既是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陶然40年持之以恒的文学创作及其丰硕的成果,显示了他对文学的坚守和对香港文学的情怀,推动了香港文学事业的发展。其作品中的人性书写、城市书写、跨地域书写以及多元文体创作实践,都显示出独特的价值立场和美学观念。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以“立足本土,兼顾海外;不问流派,但求高品质”作为办刊原则和办刊方向,促进了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之间的交流,推动了华文文学的发展。

(王志彬)

“大白鲸世界杯”幻想儿童文学奖启动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和大连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启动。该奖项以“保卫想象力”为宗旨,鼓励优秀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创作,希望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快乐健康地成长。评奖将坚持思想

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评选出有利于培养儿童想象力、富有艺术魅力、为少儿喜闻乐见,有利于提高儿童思想品德、文化素质和审美情趣的优秀作品。除专家评审外,评奖还将特设小读者评审团。此次活动也是大连出版社幻想儿童文学“十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范 得)

以滚烫的诗句书写一代伟人

本报讯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前夕,由华夏新诗研究会、华语红色诗歌促进会、《新国风》编辑部、中华国魂编委会共同主办的“蔡诗华毛泽东诗集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殷之光、曾镇南、石英、石祥、陈飞龙、晨崧、李宏伟、丁慨然、萧鸣、康桥、绿岛、许庆胜、胡松夏等文学界人士参加研讨。

有过军旅生涯的湖南诗人蔡诗华,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始终坚持诗歌创作,以炙热的情感和滚